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探论

孙建华<sup>1,2</sup>

(1.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2. 盐城工学院 社会科学部, 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理论源泉、实践动力和思想路径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探讨并得出以下结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的思想原则和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理论源流;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需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得以孕育、萌发、形成和发展的实践动力;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思想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民族化;具体化;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1)02-0012-0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指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形成的、能够指导和规范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和理论创新活动、并随之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思维过程及其结果,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革命性、科学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等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其孕育、萌发、攀升、形成及其不断地丰富与发展深受中国社会特定的时代要求、历史任务、民族特色及其文化背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只有随着时代要求和实际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才能适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阶段的历史任务的要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获得成功提供思想先导与理论支撑。

##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理论源流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过程中产生并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特点在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看来,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民族化、具体化的思想原则和要求。

1. 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从而避免僵死地、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一直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导各国工人运动的基本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的特点决定了它可能而且也必然要求自己的理论要随着实际情况的迥异而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早在1842年,马克思在《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中就已经指出了“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sup>[1]433</sup>1845年,被恩格斯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也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及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2]55-57</sup>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也曾告诫彼·法尔曼不要错误地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

收稿日期:2011-01-12

基金项目:江苏省2010年度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CX10B-079R);南京师范大学2010年度优秀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培育项目(2010bs0011)

作者简介:孙建华(1969-),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工学院副教授,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

的定义。”<sup>[3]17</sup>1887年1月,恩格斯为了帮助美国工人政党摆脱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束缚,劝导过在美国的德国人不能不顾美国工人组织的实际,向它们生硬地灌输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他在给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的回信中特别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sup>[4]681</sup>从而帮助他们从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认识和总结运动中所犯的错误的、遭到的失败和教训。对于这些原理的实际的、灵活的运用,正如他们在《宣言》中所说的,其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2. 马克思恩格斯不断地告诫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一定要制定出和本国的现实以及历史的各种条件相适应的能够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斗争策略,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制定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又同本国的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相结合的正确策略,即实现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具体化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

1985年4月,恩格斯在《致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当得知俄国有一派青年人真诚地、无保留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点泛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时,感到非常自豪。他认为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并适时地提出了“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 and 政治条件”<sup>[4]669</sup>的正确主张。

19世纪80年代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有关著作中又重点论述了相对西方比较落后的俄国、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相关问题。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的典型是亚洲的印度和中国,它们是“亚洲式的社会”、“亚细亚式的社会”。“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

所触动。”<sup>[5]</sup>这是一种“静止的社会状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中国像一个“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sup>[2]692</sup>,而“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sup>[2]767</sup>。从马克思《资本论》到晚年“人类学笔记”的有关论述,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其一,在土地所有制关系上,东方社会中土地国有制始终占据着支配地位。马克思后来又进一步指出:“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但因此那时也就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sup>[3]</sup>其二,在社会的基本经济组织方面,东方社会主要以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农村公社或村落为组织形式。马克思指出:“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sup>[2]764</sup>其三,在政治关系方面,东方社会实行专制制度,“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sup>[6]</sup>。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各个公社相互间这种完全隔绝的状态,在全国造成虽然相同但绝非共同的利益,这就是东方专制制度的自然形成的基础”<sup>[7]</sup>。这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并不把自己的眼光局限于西方世界,相反,为完善他们新的世界观极其重视对东方国家社会的研究<sup>[8]</sup>。在研究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著名论断。马克思明确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反对那种认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的看法,强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而‘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sup>[9]</sup>。到了90年代以后,恩格斯则进一步认为,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将“成为全世界社会革命”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俄国将会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20世纪初,恩格斯所期望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终于爆发了,其发展进程虽然与恩格斯的预想不完全一致,但恩格斯的预言却为历史所证实了。无疑,这为东方落后国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民族化、具体化的创造性运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3. 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特殊历史条件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的思想原则和要求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时代,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借口“时代变化”,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当他们用新康德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修正”、“补充”并公然背弃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列宁及其战友抨击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各种机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首先,列宁始终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态度,真正做到了“马克思主义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

“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sup>[10]292</sup>早在1899年的下半年,列宁在俄国革命之初撰写《我们的纲领》一文中就明确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sup>[11]</sup>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在多个场合下强调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绝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如果“忽视那一方面,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sup>[12]268</sup>1914年2月,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对俄国民族问题作了深刻的理论分析:“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而在谈到某一国家的民族纲领时,那就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了<sup>[12]375</sup>。十月革命后,他又提出:“马克思主义的

精髓,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sup>[13]213</sup>强调了“一切抽象真理,如果应用时不不加任何分析,都会变成空谈”<sup>[14]441</sup>的辩证思想。毋庸置疑,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的思想先河。

其次,列宁还告诫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千万不要把俄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思想的特殊经验加以“绝对化”和“神圣化”。

列宁在指导共产国际的过程中,一方面注重向各国共产党人介绍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一方面又告诫他们不要把俄国经验加以绝对化和神圣化。列宁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告诫全党“必须预计到其他国家发展的一切阶段,决不要从莫斯科发号施令。”<sup>[14]763</sup>1919年3月,在给贝拉·库恩的电报中他又说:“毫无疑问,在匈牙利革命的特殊条件下,生吞活剥地全盘仿效我们俄国的策略,会是一种错误。”<sup>[15]</sup>1922年11月,他在《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中一文又慎重地提出:“决议的俄国味太浓了,它反映的是俄国经验,所以外国人完全不理解,他们也决不会满足于把这个决议像圣像那样挂在墙角,向它祷告。这样做是什么也得不到的。”<sup>[13]729</sup>列宁坚决反对人们把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的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为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避免僵死地、教条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及时提出了忠告。

第三,列宁始终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不仅要领会精神实质,学会用来解决实际问题,还要善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当成科学并不断地推向前进是列宁一以贯之的态度。列宁认为:“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sup>[12]777</sup>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不仅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落后国家指出了革命的前途和胜利的依据,而且也预见了一国革命胜利后的未来世界将由一个或者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与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并存的局面。他的这种开拓精神为各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表率。

在列宁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对每一个原理只是:(一)都要历史地;(二)都要联系其他原理;(三)都要联系具体的历史经验加以考察。因此,他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特殊历史条件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具体化的思想原则和要求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并形成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俄国工人阶级正是在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创造出一条适合本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并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

##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实践动力

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掌握了。”<sup>[16]</sup>由此可知,现实上近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需要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得以孕育、萌发、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实践动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路。要想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得以形成和不断发展,我们就必须要能够“站到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回答怎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譬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怎样才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趋势如何。”<sup>[17]</sup>毫无疑问,对这些抽象而又具体的问题的回答离开百余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程是无法得到正确的答案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不但要用马克思主义来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且同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以形成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显然,这里包含着“从理论原则到实践”和“从实践需要到理论”两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向,即运用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观才能形成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思想,才能使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两个不同的过程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反之亦然。“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而且“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sup>[18]</sup>所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客观需要同样能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发展提供强大的实践动力。

1845年春,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sup>[2]56</sup>1908年下半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文中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sup>[12]107</sup>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观点必然要求我们在考虑一切思想、认识、意识方面的范畴时都必须把产生这个思想、认识、意识的实践作为第一性的要素。众所周知,人们最初感觉的东西并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在理解了的东西才能够更深刻更正确地感觉它。因此,起初的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只有理解了才能解决本质的问题。毛泽东曾指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sup>[19]</sup>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于认识事物发展过程的理论,要求我们既要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又要在实践中验证真理和发展真理,即既要从感性认识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要学会用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坚持不解地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把握实践和认识的真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形成于百余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坚持不懈的理论探索之中,并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推进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sup>[20]</sup>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样也要经历一个从孕育、萌发、攀升、形成到不断丰富发展的逻辑进程。可想而知,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行指导,想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异于缘木求鱼大海捞针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不断发展的思想先导,又是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方法论。可以说,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从本质上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胜利。当然,社会实践不断发展的特点决定了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也就要随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任务而与时俱进地不断丰富和发展了。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

近百年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求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扬鞭奋蹄,历尽艰险,圆满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课题,凝聚并形成了以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科学发展为核心元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精髓。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科学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获得成功的有效路径,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得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思想原则和方法。

#### 1.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适应近代中国时代要求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这个时代要求就是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就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总进程和中国的具体国情。

“五四”运动使中国人找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但是找到武器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能够正确使用这一武器。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探索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径,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sup>[21]</sup>的著名论断。这个论断之要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具体化思想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在毛泽东看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只能是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

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就是“不要割断历史”,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sup>[22]</sup>无疑,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提出及其相关阐述凝聚了一代共产党人集体的智慧和心血。

命题提出后,学术界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高潮,发表了一系列的研究著作与文章,这标志着党对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之间的认识从感性阶段跃升到了理性的阶段。这个认识在接下来的延安整风到党的七大的召开得到进一步的统一,这个统一了的共识逐步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指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理论体系,它就是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径下形成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奠基之作——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难题迎刃而解了。

#### 2. 确立“解放思想”的观念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忠实地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径,面对“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局面,彻底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吹响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号角。邓小平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作为其思想及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仅科学地概括了实事求是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反复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sup>[23]143</sup>“毛泽东思想的精髓”<sup>[23]126</sup>，“马克思主义的精髓”<sup>[10]382</sup>,而且还立足中国的实际,以非凡的胆识和睿智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的提出为人们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和落后的传统观念的束缚,重新回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实事求是”思想路

线上来鼓舞了极大的勇气。

在邓小平的倡导下,我们党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原理的认识,明确了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这对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能否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际,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积极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思想的解放积极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深入发展,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的突破。在此基础之上形成的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正如江泽民所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sup>[24]</sup><sup>625</sup>“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sup>[24]</sup><sup>628</sup>。可以说,具有着实事求是基础的“解放思想”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开拓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新境界。

### 3. 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危难时期。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昂首阔步。

面临改革开放成果如何攻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如何进一步发展以及新时期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江泽民以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邃理解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篇章,增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路径的新内容。对于以上诸如此类的各种问题,江泽民认为“无论解决什么问题,都不能影响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都要为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因此“我们要继续在改革上下功夫,通过改革来推动经济发展。”“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sup>[25]</sup>历史证明,1989年6月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以后的十三年,党和政府准确地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和特征,胜利地经受住了来自国内国外政治、经济、社会以及自然界的各种风险的考验,社会和经济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并成功地实施了“一国两制”方针,香港、澳门顺利

回归,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取得历史性进展。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sup>[26]</sup>这充分说明了“与时俱进”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径。

### 4. 践行“科学发展”的理念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继承和发扬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关于发展的科学思想,扎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实践,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明确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新的中国国情相结合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阶段,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继续谱写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

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观是用来指导发展的,不能离开发展这个主题,离开了发展这个主题就没有意义了。”<sup>[27]</sup>因此他多次强调:“在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各项工作中,凡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事情我们就应当全力以赴地去做,凡是不符合的就应当毫不迟疑地去改。”<sup>[28]</sup>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体现到领导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落实到引领中国发展进步、更好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他进而又提出了“全党同志要全面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把全社会的发展积极性引导到科学发展上来,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sup>[29]</sup>显然,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中央已经能够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自觉地、主动地、富有创造性地纳入了“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这对于新世纪进一步打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局面、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具有深远的意义。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1.
-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96-397.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681.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0.
- [8] 王健.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源流[J].湖南社会科学,2009(3):19-22.
- [9] 汪信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源流[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6):645-654.
- [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1]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4-275.
- [12]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3] 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4]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1.
- [15] 列宁.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97.
- [1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04.
- [17] 邓剑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
- [18] 毛泽东.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39.
- [1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91.
- [2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3.
- [21]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8-659.
- [2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
- [2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4] 江泽民.江泽民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 [25] 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55-256.
- [26]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摘要)[J].高校理论战线,2002(11):4-11.
- [27]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850-851.
- [28]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72.
- [29]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EB/OL].(2007-10-15) [2011-01-08]. [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10/25/t20071025\\_13363361.shtml](http://www.ce.cn/xwzx/gnsz/szyw/200710/25/t20071025_13363361.shtml).

## Discussion on the Thought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SUN Jian-hua<sup>1,2</sup>

- (1.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Jiangsu Nanjing 210097,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This thesis discusses several basic problems of the Thought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from three aspects: it's source of theory, it's practical motive force and it's route of thought.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obtained. The source of theory of the Thought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is the thought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ization and concretization of Marxism which were declared by those Marxism classical writers as Marx, Engels and Lenin. The practical motive force of the thought's forming and developing is the objective demands of China's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thought route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s forming and developing is Chinese Marxists' scientific Marxism view of emancipating the mi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keeping pace with time and developing scientifically.

**Keywords:** Thought of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nationalization; concretization; Sinicization

(责任编辑:李 军;校对:洪 林)